

从社会史取径转向文化史进路*

——苏珊·卡兰特-纳恩的宗教改革史研究析论

付亮

【提要】 苏珊·卡兰特-纳恩是美国著名的德国宗教改革史专家。她早年汲取社会学方法,受结构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启发,并在默勒、斯克里布纳与戴维斯等社会史学家的影响下,投身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为这一取径的深入发展作出了贡献。卡兰特-纳恩的早期著作探讨萨克森与图林根的乡村和领地城市在宗教改革冲击下的社会变化,可谓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范本。但其研究方法没能揭示为何在宗教改革爆发后的一段时期内,民众仍旧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了中世纪天主教的某些信仰敬虔方式,对新教如何重新构建民众的宗教活动亦缺少深刻的解读。卡兰特-纳恩意识到社会史取径无法解决这类问题,转而借鉴和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同时接纳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从而参与开创了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领域。她撰写多部有关仪式与情绪的史学著作,借由开掘新教与普通信众在宗教习俗与信仰操作方面的互动和博弈,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逻辑,让德国宗教改革史研究别开新境。

【关键词】 苏珊·卡兰特-纳恩 社会史 文化史 宗教改革

2021年,苏珊·卡兰特-纳恩(1941—)与乌特·洛茨-霍伊曼主编的论文集《宗教改革的文化史:理论与应用》出版,说明欧美的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后,已经达到新的高度。^①两位主编是享誉学界的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中世纪晚期与宗教改革研究中心(Division for Late Medieval and Reformation Studies)的同事,并先后担任该中心的主任。其中,于2016年荣休的卡兰特-纳恩,是蜚声近代早期欧洲史学领域的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她近半个世纪的研究生涯,见证了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发展与成熟,亦见证了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的起步与腾飞。实际上,卡兰特-纳恩不仅是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参与者与推动者,而且适时转型,成为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的引领者。

本文拟论析卡兰特-纳恩从社会史取径转向文化史进路的缘由及其治学特色,希冀揭示宗教改革史研究嬗变之深层肌理。除此之外,本文还有两层考虑。其一,中文学界对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与学术史梳理,已取得不俗的成绩,但对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的理路尚缺乏充分的关注与探析。^②其二,卡兰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政教关系核心文献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16)的阶段性成果。

① Susan C. Karant-Nunn and Ute Lotz-Heumann, eds.,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2021.

② 譬如刘林海:《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与罗马公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吴愁:《宗教改革早期教派的多元化与奥格斯堡“新教认同”的构建》,《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世界历史》2020年第2期;周施廷:《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维滕贝格大学的医学教育》,《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8年第4期;朱孝远:《宗教改革研究中的公共阐释学》,《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特-纳恩是美国人,她对德国宗教改革的研究就是在研究外国史,可以给中国学界研究外国史带来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一、卡兰特-纳恩的学术经历

亚利桑那大学中世纪晚期与宗教改革研究中心,由荷兰著名历史学家海科·奥伯曼(Heiko A. Oberman, 1930—2001年)创建。奥伯曼在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哈佛大学与图宾根大学任教,于历史学和神学领域皆有深厚造诣。他于1984年赴美后,着手设立私人图书馆,创建这一研究中心。^①该中心致力于探研1400—1800年的欧洲历史,几十年来已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宗教改革史研究机构,在研究理路方面影响了欧美学界。在奥伯曼任上,该中心是推动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重镇。1999年,卡兰特-纳恩受邀来到亚利桑那大学,担任该中心的助理主任。

卡兰特-纳恩在转投亚利桑那大学之前,在波特兰州立大学任教29年,当时她已是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资深学者。她早期的两部作品汲纳社会学方法,探讨神圣罗马帝国东部、德国宗教改革的腹地萨克森(Saxony)和图林根(Thuringia)在宗教革命中的社会变化。^②鉴于萨克森与图林根的地理位置,卡兰特-纳恩是当时少数有机会去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搜集档案的英美学者之一。^③

不过,卡兰特-纳恩并没有止步于宗教改革社会史取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她便开始关注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成为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风潮的引领者。她在1997年推出的《仪式的宗教改革:诠释近代早期德国》(以下简称《仪式的宗教改革》)一书,就是其采取文化史路径重新解读德国宗教改革的作品,在学界影响颇大。^④该书获得美国历史学与神学领域著名的罗兰·班顿奖(the Roland Bainton Book Prize)。此书也宣告卡兰特-纳恩成为该研究取径的旗手。正是由于卡兰特-纳恩在宗教改革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领域皆有造诣,故得到奥伯曼的赏识,受邀加盟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中心。2001年,奥伯曼去世,卡兰特-纳恩接任中心主任一职。此后十年,她不仅继续著书立说,还在同仁的帮助下筹得近200万美元捐款,为中心设立“海科·奥伯曼讲席”。卡兰特-纳恩随后成为海科·奥伯曼讲席教授。2010年,她再出力作《感觉的宗教改革:形塑近代早期德国的多种宗教情绪》(以下简称《感觉的宗教改革》),进一步深化了宗教改革研究的文化史进路。^⑤

21世纪的最初十年,卡兰特-纳恩与另一位美国同仁、弗吉尼亚大学的意大利宗教改革史专家安妮·雅各布森·舒特(Anne Jacobson Schutte)共同担任《宗教改革史档案》(*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的

① 关于奥伯曼的治学特色与学术贡献,以及他对美国宗教改革史研究的促进作用,参见 Thomas A. Brady, et al., “Introduction”, in Thomas A. Brady, Katherine G. Brady, Susan C. Karant-Nunn, and James D. Tracy, eds., *The Work of Heiko A. Oberman: Papers from the Symposium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Brill, 2003, pp. 1-7; G. H. M. Posthumus Meyjes, “The Life of Heiko Augustinus Oberman: 15 October 1930—22 April 2001”, in Thomas A. Brady, Katherine G. Brady, Susan C. Karant-Nunn, and James D. Tracy, eds., *The Work of Heiko A. Oberman: Papers from the Symposium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pp. 195-202。

② Susan C. Karant-Nunn, *Luther's Pastors: The Reformation in the Ernestine Countryside*,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79; *Zwickau in Transition, 1500-1547: The Reformation as an Agent of Chang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 James J. Blakeley and Robert J. Christman, “Prologue”, in Victoria Christman and Marjorie Elizabeth Plummer, eds., *Cultural Shifts and Ritual Transformations in Reformation Europe: Essays in Honor of Susan C. Karant-Nunn*, Brill, 2020, pp. 1-2。

④ Susan C. Karant-Nunn, *The Reformation of Ritual: An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Modern Germany*, Routledge, 1997。

⑤ Susan C. Karant-Nunn, *The Reformation of Feeling: Shaping the Religious Emotions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北美执行编辑。^①《宗教改革史档案》创刊于1904年,本是一份德国刊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刊物由德国与美国联合主办,如今已是宗教改革史领域最权威的刊物。2016年,卡兰特-纳恩荣休后,她所在的中心又获得100万美元的捐赠,并以她的名字设立了“苏珊·卡兰特-纳恩讲席”。

二、投入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

20世纪70年代,卡兰特-纳恩撰写博士论文,试图考察萨克森选帝侯地区的福音堂区神职人员(即新一代牧师)的应征与改宗。她后来尝试在俄亥俄大学出版社的一个新的丛书系列——宗教改革研究系列(*Studies in the Reformation*)出版她的博士论文,但卡兰特-纳恩失败了。丛书编辑甚至拒绝让她看审稿专家的评审决议,理由是她的书遭到严厉尖刻的评论。^②卡兰特-纳恩的书最后只能在别的地方出版。究其原因,是当时的审稿专家不能接受卡兰特-纳恩借鉴社会科学理论的做法,尤其是她的社会史取径。不过,长期在英国教书的澳大利亚著名宗教改革史专家罗伯特·斯克里布纳(Robert Scribner)却盛赞卡兰特-纳恩的作品。他认为,在当时很少有研究重点关注德国宗教改革在堂区层面的具体情况,历史学家们通常忽视改革者们的崇高理念在多大程度上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践行。基于此,卡兰特-纳恩的著作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③斯克里布纳对卡兰特-纳恩惺惺相惜,并提携后者,恰是因为他本人便是主张在宗教改革史研究中运用理论的先行者。根据卡兰特-纳恩的回忆,当时德国的“教会史家”^④不仅对斯克里布纳的研究理路颇有微词,而且他们对吸收和运用社会学方法的宗教改革史成果没有兴趣。^⑤

实际上,美国一些宗教改革史专家对卡兰特-纳恩的社会史研究取径的批评,甚至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卡兰特-纳恩给《16世纪学刊》(*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投稿,有两位匿名评审认为她的文章不能发表,除非删去所有借用社会科学理论做出的历史解释。卡兰特-纳恩拒绝修改。^⑥最后,在1994年,她的论文发表于《跨学科史学》。^⑦

卡兰特-纳恩这一代学者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深受贝恩德·默勒(Bernd Moeller)、斯克里布纳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等史学家的影响。^⑧他们反对自19世纪以来奠定的有关宗教改革,特别是德国宗教改革的经典研究范式,即只关注神学以及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的思想

① James J. Blakeley and Robert J. Christman, “Prologue”, p. 3.

② Susan C. Karant-Nunn and Ute Lotz-Heumann, “Introduction”, in Susan C. Karant-Nunn and Ute Lotz-Heumann, eds.,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p. 11.

③ R. W. Scribner, “Review: Luther’s Pastors: The Reformation in the Ernestine Countryside by Susan C. Karant-Nunn”,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32, No. 3, 1981, p. 383.

④ 需要指出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德国的宗教史研究不是历史学科目,而属于神学科目,也不放在历史学系。譬如,天主教历史放在天主教神学系,新教历史(例如宗教改革史)则放在新教神学系。宗教史学者认为自己是“教会史家”,即研究神学教义、典章制度、宗教精英人物等,对于借鉴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的宗教史研究则不感兴趣。

⑤ Susan C. Karant-Nunn, “Introduction”, in Matthias Pohlig, ed., *Susan C. Karant-Nunn: Ritual, Gender, Emotions (Essays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Mohr Siebeck, 2022, pp. 1–2.

⑥ Susan C. Karant-Nunn and Ute Lotz-Heumann, “Introduction”, p. 12.

⑦ Susan C. Karant-Nunn, “Neoclericalism and Anticlericalism in Saxony, 1555–1675”,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24, No. 4, 1994, pp. 615–637.

⑧ 戴维斯及其《马丁·盖尔归来》在中国学界广为人知,但我们大多从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的角度来审视她的史学贡献,对其早期作为宗教改革社会史的推动者给相关领域带来的深远影响,缺少关注与分析。

观念,并由此来做基于教派分野的价值判断。

对此,不妨展开梳理,以有助于理解为何宗教改革社会史进路会出现,以及缘何卡兰特-纳恩参与进来。就德国宗教改革史研究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有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当时由兰克奠定的“从路德到俾斯麦”(Luther-to-Bismarck)的线性进步史观占据上风。这种史观的核心是: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是“日耳曼事件”,适合日耳曼民族;本来可以取得辉煌的胜利,但在16世纪20年代遭遇挫折;普鲁士时期又让路德宗恢复生命力;德国宗教改革既是德国历史的转折点,亦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更是世界历史走向近代的开端。因此,德国宗教改革研究在19世纪是显学,不只在德国,甚至在欧洲皆处于史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间德国宗教改革研究由于德国政治与战争的实际处境,以及涉及民族主义的神话、迷思与纷争等,学界对其失去兴趣,成为边缘领域。^①德国著名历史学家默勒曾感叹:宗教改革史已经衰落到跟古物研究相似的境地了。他还指出,除了哥廷根大学和其他少数几个地方之外,操德语且不关注神学的历史学家通常会忽视1500—1650年的德国历史(即宗教改革史)。默勒认为,拘囿于探讨思想精英的神学教义论争的宗教改革研究取径已经行不通了,他呼吁这一领域与政治史甚至是社会史结合起来。^②

默勒率先垂范,于1962年出版《帝国城市与宗教改革》一书,并提出“城市宗教改革”(the Urban Reformation)的解释范式。默勒认为,路德神学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剧烈碰撞有力地影响了双方。其他宗教领袖的改革思维与南德自由城市之间的互动有类似的历史效果。他坚信宗教改革是城市运动,城市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呼吁学界仔细探究宗教改革运动与帝国城市、自由城市之间的关系。此书很快在1966年被译为法文出版,在1972年被译为英文出版,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③

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末,卡兰特-纳恩身处的美国学术界与欧洲学术界的研究旨趣差别不大,宗教改革史的教学与研究范畴主要集中在精英人物的思想与传记。人文主义的主要作用被认为是为宗教改革理念提供了前期准备。诸如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胡斯(Jan Hus)、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等人,无一不被视为宗教改革的先驱。天主教會的衰落更是一个常用字眼。当时普遍认为宗教改革乃是对中世纪晚期欧洲的衰落所做出的反应。故而,宗教改革历史叙事的主角便是精英人物(特别是神学家与人文主义者)及其神学思想。但是,默勒的研究理路强烈地冲击了英语学界,多位美英历史学家不同程度地在研究中吸收了他的方法。譬如,格拉尔德·施特劳斯和哈罗德·格里姆对纽伦堡的研究;米里亚姆·克里斯曼对斯特拉斯堡的研究;罗伯特·沃尔顿对苏黎世的研究;戴维斯对里昂的研究;罗伯特·金登和E.威廉·蒙特对日内瓦的研究。^④就连当时在耶鲁大学执教的中世纪晚期文化与宗教史名家史蒂文·奥兹门特都受到默勒的影响。他在1975年出版

① Thomas A. Brady,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German History*,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8, pp. 12 - 18.

② Bernd Moeller, *Imperial Cities and the Reformatio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 C. Erik Midelfort and Mark U. Edwards, Fortress Press, 1972, pp. 3, 12 - 16.

③ 参见 Bernd Moeller, *Reichsstadt und Reformation*, Mohn, 1962; *Villes d'Empire et Réformation*, traduit par Albert Chenou, Droz, 1966; *Imperial Cities and the Reformation*. 默勒的“城市宗教改革”范式所推动的研究热潮与从中涌现的学术著作,已有学者做过归纳,参见 Basil Hall, “The Reformation City”,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Vol. 54, No. 1, 1971, pp. 103 - 148.

④ Gerald Strauss,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Wiley, 1966; Harold J. Grimm, *Lazarus Spengler: A Lay Leader of the Reform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Miriam Usher Chrisman, *Strasbourg and the Reform: A Study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Robert Walton, *Zwingli's Theocrac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7; Robert M. Kingdon, *Geneva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French Protestant Movement, 1564 - 1572: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ongregationalism, Presbyterianism, and Calvinist Resistance Theory*, Librairie Droz, 1967; E. William Monter, *Calvin's Geneva*, R. E. Kriger, 1967.

的颇具影响力的专著中,尝试将宗教改革社会史与宗教改革的中世纪思想起源结合在一起考察。^①

可以说,在宗教改革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逐渐焕发生机的浪潮中,卡兰特-纳恩属于受“城市宗教改革”范式影响的第二代美国学者。她的博士生导师施特劳斯,是英语学界率先从社会史视角考察宗教改革的学者之一。他于1967年发表在《过去与现在》上的论文,采用社会史方法探索纽伦堡贵族阶级的政治文化,对学界有较大影响。^②

除了默勒开启的研究进路之外,给予卡兰特-纳恩最大影响的是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启发,特别是将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那些先锋历史学家的著作。其中,斯克里布纳与戴维斯给予她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据卡兰特-纳恩回忆,在1977年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市(Flagstaff)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戴维斯在点评会议论文的过程中,建议卡兰特-纳恩借鉴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的理论框架来考量宗教改革时期萨克森地区的大众文化。^③

其实,卡兰特-纳恩在印第安纳大学读博期间,她的导师施特劳斯就提醒她不要沾染理论。而卡兰特-纳恩并没有服膺师训。实际上,宗教改革史研究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相当排斥在其他史学研究领域早已使用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斯克里布纳甚至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中抱怨,并指出学术界虽然有宗教改革社会史这一研究进路,但它仍然微不足道,甚至让人困惑,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④

众所周知,传统的社会史是借由分析目标社会的群体来研究人类的过往。目标社会的群体如何凭借相互关系而生存,并生发出自身的结构和文化,是社会史关注之所在。^⑤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就宗教改革社会史而言,大体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分析型社会史,其问题链是:谁促使宗教改革出现?什么人或什么类型的人群,何时、何地、何因,参与宗教改革运动,或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相关答案就涉及阶级、阶层、性别、职业与家庭等,同时涉及地域情况与时空差别。此外,群体的动机亦在考察之列。凡此种种,皆需要社会学方法。其中,定量分析尤为需要。其二是诠释型社会史。其问题链是:宗教改革让谁受益?又伤害了谁的利益?宗教改革促进了哪些社会发展?阻碍了哪些社会进程?转换了何种社会方向?相关解答涉及如何理解天主教在中世纪晚期的历史定位,也牵涉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的社会演化问题。

此外,宗教改革社会史受到结构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尤深。结构主义史学重视超越个体进程的条件(譬如等级、身份),认为其优先于事件与个体。结构主义史学尤为看重持久的运作机制与思维习惯,而不像传统政治史那样只注重国家本身和政治权力。事实上,结构主义史学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念与心态史路径。就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历史唯物主义让宗教改革史研究者逐渐重视劳动分工与生产资料的掌控所引发的社会冲突,让他们更重视社会结构与阶级冲突。因此,“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说,乃是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重要一环。^⑥

从理论上促进宗教改革社会史出现的还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与恩斯特·特勒尔奇

① Steven Ozment, *The Reformation in the Cities: The Appeal of Protestantism to Sixteenth-Century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② Gerald Strauss, "Protestant Dogma and City Government: The Case of Nuremberg", *Past and Present*, Vol. 36, Issue 1, 1967, pp. 38 - 58.

③ Susan C. Karant-Nunn, "Introduction", p. 3.

④ 参见 Robert Scribner, "Is Ther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Social History*, Vol. 2, No. 4, 1977, pp. 483 - 505.

⑤ 关于社会史进路,参见 E. J. Hobsbawm,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Daedalus*, Vol. 100, No. 1, 1971, pp. 20 - 45.

⑥ 早有欧洲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对于宗教史研究与神学研究都有巨大价值。参见 Ernst Troeltsch,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Vol. II, trans. Olive Wyon, Harper & Brothers, 1960, pp. 1002 - 1003.

(Ernst Troeltsch)。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近,韦伯与特勒尔奇都把宗教改革视为欧洲通向近代精神与近代社会的转折点。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世俗的禁欲苦修精神,认为这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行且明智的方法。也就是说,在16世纪,欧洲之走向近代性,恰好体现在加尔文宗(或曰归正宗)与社会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之中。^①特勒尔奇则认为基督教对尘世的态度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地因应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现实。特勒尔奇利用这种认识审视宗教改革运动。他认为路德宗是中世纪教会文化的僵化残余,加尔文宗则为近代性准备了基础。特勒尔奇眼中的近代性,指的是个体主义、注重精神的宗教、政教分离、宽容与民主。就宗教改革而言,如果说韦伯关注的是加尔文宗与资本主义的内在互动关系,那特勒尔奇则看重有内在关联的两个问题:宗教改革到底在欧洲的历史上居于什么位置?为什么宗教改革会裂变出许多龃龉冲突的教派?针对第一个问题,特勒尔奇认为德国的路德宗(或曰信义宗)虽然失败了,但作为整体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欧洲走向世俗近代性的开端。至于第二个问题,特勒尔奇更看重从社会角度而非民族角度来解答:路德宗反映了德国社会的落后状况,而加尔文宗、再洗礼派、清教,则体现了西北欧的成熟的资产阶级文化。^②总之,在方法和理论的刺激下,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宗教改革史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宗教改革已经被视为一系列复杂的、多维度的、有差别的历史现象。

上述便是卡兰特-纳恩最初两部专著撰写与出版的学术语境。两部作品展现了分析型社会史与诠释型社会史的特点与问题。在1979年出版的第一部专著《路德的牧师:埃内斯丁乡村的宗教改革》中,卡兰特-纳恩充分利用在东德地区搜集的原始资料,分析16世纪20—50年代萨克森选帝侯地区和图林根地区乡村牧师的生活。根据卡兰特-纳恩的梳理,可知这批人属于德国宗教改革开启后的第一代牧师。也就是说,这些人中的许多人起初仍然是主教管辖下的乡村堂区神父。宗教改革爆发后,有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新挑战,有人则反对新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乡村中从神父转型为牧师的人之外,埃内斯丁乡村接收了城镇出身的居民与教师来担任牧师。^③此后,新一代牧师都在大学受过神学训练。但是,路德理念深入乡村的过程并非如此简单。合格的牧师一度是短缺的,提供给他们的薪水也缺少吸引力,再加之他们对选帝侯代表的干预行为非常反感,这就导致传播新信仰的速度受到影响。^④

在萨克森选帝侯领地与图林根地区,巡查制度逐渐流行。卡兰特-纳恩仔细研读巡查记录,梳理当地对牧师群体的监督与纠偏,并以此来理解其时乡村牧师的实际生活条件。她发现当时的牧师面临许多困难。那些牧师在开展属灵工作的过程中,既要想办法解决家庭的温饱问题,还要苦于应付咄咄逼人的贵族与充满敌意的农民。她还发现乡村牧师在当地获取的实际收入,即便加上选帝侯政府给予的补助,也难以减轻生活的艰辛。实际上,牧师与村民之间在经济上的纠纷时有发生。即便牧师努力按照路德福音去改造村民的生活,改进村民的信仰操作,但他们与保守的村民之间的天然对立紧张关系是不能忽视的。最后,卡兰特-纳恩认为,即便路德的理念对村民并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但最终村民还是逐渐接受了路德福音,这是因为一方面牧师群体改进了他们的教牧行为与职业操守,另一方面是因为村民别无选择。^⑤

①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alcott Parsons, Routledge, 1992, pp. 56 - 80.

② Ernst Troeltsch,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Vol. II, pp. 515 - 574, 576 - 687.

③ Susan C. Karant-Nunn, *Luther's Pastors: The Reformation in the Ernestine Countryside*, pp. 8 - 13.

④ Susan C. Karant-Nunn, *Luther's Pastors: The Reformation in the Ernestine Countryside*, pp. 31 - 37.

⑤ Susan C. Karant-Nunn, *Luther's Pastors: The Reformation in the Ernestine Countryside*, pp. 70 - 73.

此书的焦点是第一代遵奉路德精神的牧师。卡兰特-纳恩对那批牧师的社会背景与教育背景、他们的招募以及他们的实际生活条件,作出了细腻的梳理和分析。但是,该书没能充分说明那些牧师究竟是如何让村民接受路德福音的,又是如何重构村民的宗教活动的。易言之,那批路德派牧师是如何开展如此棘手的任务的?他们在布道和其他教牧工作中是如何实现核心目的的?实际上,卡兰特-纳恩在书中提到的牧师与信徒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恰恰说明了中世纪信仰的残留与韧劲。这其实涉及村民活生生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当时卡兰特-纳恩的社会史取径尚无法解决的问题。

卡兰特-纳恩的第二本书《转型中的茨维考(1500—1547年):作为变化驱动力的宗教改革》,将焦点从乡村转向城市,考察萨克森的重要城市茨维考。茨维考位于厄尔士山脉边缘,当时大约有7500人,乃布匹贸易之城,是选帝侯眼中的“萨克森的威尼斯”。^①卡兰特-纳恩在茨维考与魏玛两地档案馆爬梳史料、钩沉史实,她的这本书虽然是彼时如火如荼的“城市宗教改革”研究风潮中的一员,但她并没有像其他众多学者那样去关注南部的自由城市,而是另辟蹊径,选取一个重要的领地城市来考察。与帝国自由城市不同,在领地城市,新教的传播和发展不只受制于市民与寡头权威之间的双向互动与博弈,还要应对领地诸侯的影响。在茨维考,领地诸侯便是萨克森选帝侯。

在此书中,卡兰特-纳恩充分展现了社会史的研究思路,她真正在意的不是宗教改革本身,而是其给城市的政治、社会乃至文化生活带来的种种变化。她首先铺陈城市的管理结构与该城基于布匹贸易的经济结构。卡兰特-纳恩还细腻地描述了16世纪初莱比锡在布匹贸易上给茨维考带来的挑战。16世纪初,茨维考经济开始滑坡,但市政会的寡头统治却在发展,而且与行会之间的关系渐趋疏远,两者之间冲突不断。在宗教改革爆发前,两者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选帝侯支持的当地寡头取得胜利,民众追求的改革则受挫。这就给路德理念的进入预留了空间。铺设完政治与经济的结构之后,卡兰特-纳恩开始描述和分析茨维考民众运动的兴衰。当地的民众运动在精神与理念上受到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的启发,在具体行动上则由被称作“茨维考先知”的手工匠改革者引领。1521—1522年,这场民众运动达到顶峰。卡兰特-纳恩认为,民众起初觉得他们发起的改革运动可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宗教改革授权他们用各种方式打击腐败、抵抗压迫,以至于他们幻想即将回到体现行会集体(即公社共同体)尊严的黄金时代。但是,寡头集团并不会让民众实现梦想,他们认为借助路德理念反倒可以在不公开改变传统政治模式的情况下,全面控制茨维考。于是,寡头集团支持的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取代了民众的改革运动,而其中的最大受益人便是选帝侯。最终,宗教改革在茨维考得到巩固,寡头统治亦如是。萨克森选帝侯则在施马尔卡尔登战役后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的统治。^②

借由对茨维考宗教改革运动的考察,卡兰特-纳恩认为,宗教改革并不是城市嬗变的发起因素或原动力,而是1520年之前就已经有所成型的社会发展的催化剂。通过考量茨维考的三股力量——民众追求的改革、寡头寻求的改革与诸侯的控制——之间的互动激荡,卡兰特-纳恩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一个观点:在宗教改革的进程中,民众希冀的改革走向失败,而当局控制的改革取得成功。可以说,卡兰特-纳恩的这本书是当时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一个范本,其展现的解释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主流研究所认可。此解释模式是,宗教改革起初刺激各方力量去夺取对日常生活

^① Susan C. Karant-Nunn, *Zwickau in Transition, 1500 - 1547: The Reformation as an Agent of Change*, p. 9.

^② Susan C. Karant-Nunn, *Zwickau in Transition, 1500 - 1547: The Reformation as an Agent of Change*, pp. 9 - 19, 21 - 55, 138 - 152.

的控制权,但最后新教站在了追求中央集权的世俗权威的一方。

卡兰特-纳恩的解释模式涉及两组对抗:其一,是福音运动对旧宗教(天主教)的打击;其二,是福音运动的各派力量对新宗教控制权的争夺。^①但也就是在这里,宗教改革社会史进路始终无法解决一个关键问题:旧宗教的残余和坚韧。换言之,福音运动是如何在细节中改造信仰的。这是卡兰特-纳恩的第二本著作仍然没能解决的问题。

总之,卡兰特-纳恩的这两本专著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史主流作品,主张全方位地检视宗教改革爆发的社会、经济、政治与宗教因素。它们对宗教改革的解读,实则将这个历史事件降格为推动变化的催化剂,而且认为相关变化并非如此“进步”,故而让持线性进步史观的历史学家与习惯于静态解读精英人物的教义学说的神学家感到愤怒。此外,从宗教改革社会史本身的发展脉络而言,以斯科里布纳、戴维斯与约翰·博西^②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开始益发强调普通人在社会演变与时代巨变中的作用、处境与抉择。这给了卡兰特-纳恩启发,并且辅助她开始转型,从而走向宗教改革文化史的研究之路。

三、引领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

前文指出,传统的社会史方法主要关注涉及不同群体的网络与冲突,对于活生生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则力有未逮。实际上,社会史进路虽然在分析经济与社会变化方面有良好效果,但在解读宗教信仰问题上常出现简单化倾向,特别是在理解宗教社会方面出现偏颇。卡兰特-纳恩的最初两部作品都有类似问题。因此,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寻找方法论的启发,在不同学科的交叉点寻求视角与解释的突破,便成为宗教改革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题中之义。

如果回首20世纪后半期,不难发现宗教研究虽然迭经变化,其中有一点至关重要,即这一研究不再只是有宗教信仰之人独占的领域,反而越来越多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研究人员投身其中。就历史学而言,这就打破了宗教史研究的壁垒。宗教史研究终于与文学研究、经济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一道,成为“研究人的科学”(sciences humaines)。于是,学者们寻求新的解释框架来探析宗教的历史,社会学方法和人类学理路渐为学者所重。这在基督宗教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与马克思的社会学、莫斯(Marcel Mauss)和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人类学,就深刻地影响了法国年鉴学派与法国宗教社会学。^③在探索“宗教生活的基本形态”与“道德共同体”的过程中,法国学者先行运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探研基督宗教的各种仪式。在他们看来,宗教是理解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切入点,运用各种手段理解宗教,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

循此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文化史研究遍地开花,借助宗教仪式来考量历史递嬗与历史情境,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一文对国际学界影响甚巨,许多历史学家开始运用文化人类学进行研究。文化成为理解宗教的框架。学者们开始在宗教文化中确认内在逻辑,并且借由人群参与的叙述与仪式来追寻内在逻辑,同时寻求解释人群

^① Susan C. Karant-Nunn, *Zwickau in Transition, 1500 - 1547: The Reformation as an Agent of Change*, pp. 177 - 214.

^② 自20世纪60年代起,博西在史学研究中借鉴宗教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著述颇丰,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基督教史研究影响深远。他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专著是:John Bossy,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1400 - 17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③ Miri Rubin, "Religion", in Inlinka Rublack, ed., *A Concise Companion to History*, Oxford Press University, 2011, pp. 317 - 318.

活动的意义。^① 因此之故,宗教史学者与曾经的教会史专家已经大为不同,他们不再执着于传统的研究课题:神学的发展变化、教会制度史、教会法及其诠释、伟大人物的历史影响等。宗教史学者对“活生生的宗教”与宗教文化史更感兴趣。他们更愿意开掘不同信众群体的多维宗教体验。此外,宗教世界观以何种方式构造普通人的生活,也是吸引他们的研究课题。在这一学术发展进程中,社会学取径逐渐转向人类学进路,即更关注连续性而非革命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学者们更关注的是符号(表征)和意义(社会构建的角色),而非行为本身。

对此,斯克里布纳早有察觉,开始调整社会史取径,转向分析信仰共同体的具体信仰操作,并“深描”仪式是如何被转化、传播,并最终内化为特定的社会信息。也就是说,他已经不满足于社会学方法,而是汲取文化人类学理论。卡兰特-纳恩对此深表认同。她坚信理论并非深渊的边缘,而是以新方法探讨主题和证据的促进因素。在此必须揭示一点: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戴维斯就已经建议卡兰特-纳恩汲取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只是当时的卡兰特-纳恩一方面需要时间来吸收、借鉴,以便为学术转型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她不得不面临来自同侪的巨大压力。据她回忆,当时她的美国同事大半聚焦于教会史的传统选题,对人类学理论和大众文化等题材则采取敌视的态度。^② 如果充分考虑到新研究在发表出版上面临的种种挑战,我们便不难理解彼时卡兰特-纳恩的处境与心境,我们或许也更能理解何以斯克里布纳提出“到底有无宗教改革社会史”这一微妙的问题。

实际上,在斯克里布纳与卡兰特-纳恩这些学者看来,文化史理路不会按照表面意思来处理教义与信仰的问题,这样有助于尝试恢复宗教信仰的本来面目。易言之,观念是能够塑造现实的,至少在基本的层面上可以形塑人们对现实的感知。20世纪90年代,除了文化人类学之外,人种志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业已为斯克里布纳等人所汲纳。在历史学“文化转向”的大趋势下,宗教改革文化史理路登上舞台。

在敬虔仪式与民众信仰方面的研究,斯克里布纳堪称代表。实际上,普通人的宗教信仰让他发现了斯时世界的一种心态或心理上的“范型”:多种权力与保护物(譬如护身符)搭建的网络,可以让普通人应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借由研究天主教,他创设了一个解释框架,用以考量新教创新的一面与压迫的一面——“尘世的神圣观”与“形式化的重复的仪礼”。在斯克里布纳看来,宗教实则是文化核心、核心价值观与动机的承载物以及转向行动的情感刺激,所以要更新对宗教改革的理解,就要对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进行“系统升级”。^③ 但天不假年,斯克里布纳在学术研究的巅峰期罹患癌症,于1998年去世。卡兰特-纳恩则继承斯克里布纳在宗教改革仪式研究方面打造的文化史雏形,并向纵深发展。其实,卡兰特-纳恩于1997年推出的《仪式的宗教改革》,正是斯克里布纳生前约请她撰写的。^④

整体来看,此书借由对仪式及其符号意义的探讨,揭示和强调了时人在遭遇宗教改革、体验宗教改革以及因应宗教改革过程中使用的种种方法与手段。换言之,卡兰特-纳恩一改往日学者的传统研究方法,不再局限于思想精英的拉丁文神学著述,而是像人类学家走入田野那般,以教会的各项仪

① Miri Rubin, “Religion”, pp. 318 – 321.

② Susan C. Karant-Nunn, “Introduction”, pp. 3 – 4.

③ R. W. Scribner, *Popular Culture and Popular Movements in Reformation Germany*, The Hambledon Press, 1987.

④ Susan C. Karant-Nunn, “Changing One’s Mind: Transformations in Reformation History from a Germanist’s Perspective”,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58, No. 4, 2005, p. 1120.

式为突破口,考察普通人在宗教变革时代的日常生存与人生过渡期的种种关口。该书考察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萨克森和图林根,而是涵盖了德国的更多地区。此外,该书还汲纳了“教派化”命题与“社会规训”范式,^①不仅考察了新教对仪式的掌控,也避免了以往用新教标准评判天主教的做法,持平地分析了天主教对仪式的操控,以此来分析双方如何利用仪式来规训信众和明确身份认同,从而把“仪式学”放置在近代早期国家政权发展的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事实上,新教的出现导致近代早期欧洲不得不重新考量所有礼拜仪式。教会仪式经改变以展现基督教信仰的新视角,并将此视角传递给民众。故而,卡兰特-纳恩着重探析宗教仪式在近代早期德国社会中的功用,以及宗教改革在多大程度上修改了宗教仪式,并尝试揭示宗教仪式变化的意义。她考察了主要的仪式:出生、洗礼、坚振礼、订婚、婚礼、妇女生育后去教堂领受的感恩仪式、忏悔礼、圣餐礼和终傅礼等。卡兰特-纳恩认为,在宗教改革运动爆发的百年过程中,宗教仪式的诸多变化所反映出的内容,远不止神学变化那么简单。实际上,宗教仪式是施加规训的手段,让神圣性不再那么容易接近。教会和国家联手,借仪式来控制民众。

卡兰特-纳恩既考察了早期的路德宗,也考量了尔后兴起的加尔文宗,并探索了宗教信仰操作中的地区差异。而且,她把新教的宗教仪式与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仪式加以比较,尝试分析平信徒在多大程度上采纳了官方的观点。可以说,《仪式的宗教改革》与采取宗教改革社会史进路的作品差异很大,既关注经历变革的宗教的政治作用,亦开掘信徒群体的日常宗教习俗与具体操作,而且最重要的是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逻辑。

21世纪初,感觉史、^②情感史^③等新文化史课题蓬勃发展,同时推动了宗教改革研究的进一步“文化转向”。卡兰特-纳恩对宗教改革文化史理路的进一步深入,就体现在她对宗教改革时期感觉与情绪的书写中。当时,感觉与情绪在传播、巩固信仰上有何作用?罗马天主教、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如何把静态的教义与动态的情感加以接榫,以便说服信众,坚定他们的信念,塑造他们的行为,构建他们的感觉?简言之,种种做法是如何全方位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加固信仰的?卡兰特-纳恩在2010年推出的《感觉的宗教改革》即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说,她的文化史取径针对的是时人在鲜活的信仰生活中如何面对与因应宗教改革的吸引力与冲击力的问题。

卡兰特-纳恩所用的史料,以16世纪新教和天主教探讨死亡与耶稣受难的讲道辞为主。借由解读讲道辞,她试图“聆听”(listen)“标示不同类型情绪的词藻”,以呈现近代早期德国天主教和其他新教教派的情绪策略,并分析不同教派在挑动听众情绪和心灵方面的差异。譬如,各教派对于耶稣受难——耶稣之血、在蒙难地的内心焦灼、玛利亚丧子的母性之苦等——的情景铺陈就是有区别的。整体而言,随着宗教改革的爆发,基督宗教各派与其说在讲道上追求创新,毋宁说寻求强化。就罗马天主教来说,卡兰特-纳恩指出,其情绪核心中的信仰敬虔始终放在耶稣受难上。就新教教派而言,卡兰特-纳恩认为,路德宗在对中世纪天主教的延续性上最为明显,该教派对传统的攻击远没有加尔文宗极端。譬如,关于童真玛利亚的讲道,路德宗仍然继续使用,加尔文宗则从讲道辞中将其删除。此外,路德本人更愿意让听众在被讲道刺激而悲伤哭泣的时候,感受基督在牺牲自身之时所展现出的爱与怜悯,但绝大多数新教的布道人士更谨慎地对待唯爱的敬虔或可呈现的情绪。至于加尔

① Susan C. Karant-Nunn, *The Reformation of Ritual: An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Modern Germany*, p. 3.

② 涂丰恩:《感觉的历史:理论与实践》,蒋竹山主编:《当代历史学新趋势》,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29—56页。

③ 王晴佳:《为什么情感史研究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新方向》,蒋竹山主编:《当代历史学新趋势》,第57—70页。

文,卡兰特-纳恩通过研读史料,发现前人的认识有误,实则这位日内瓦的改革家意识到生动的意象与其他内化教义的手段都至关重要。但与路德希望调动听众情感而让他们更多关注基督的死亡与复活所带来的救赎力量不同的是,加尔文希望感染听众,让他们对人类的罪感到羞耻,从而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意识到若没有天主的永恒拣选,所有人则无法得到救赎。^①

纵观全书,卡兰特-纳恩想要告诉读者的是为何不同的情绪文化是理解宗教改革运动的关键。易言之,如何在当时做基督徒,是可以借由“深描”情绪文化来省视的。当然,因为没有大规模量化的数据来支撑,这种操作是揣摩的、推断的。实际上,卡兰特-纳恩也无意于量化研究。她真正在意的是去感知讲道者与听众在互动中结出的意义之网。故而,卡兰特-纳恩的书是实验性的,甚至是先锋性的,或者说它为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提出了一种初步的操作范本。若循此深入开掘,研究者或许可以在兼顾变化与连续性的基础上,考量宗教改革时期不同信仰之中的各类情绪与感觉。

结 语

投身学术研究迄今,卡兰特-纳恩已在宗教改革史领域探研擷英近半个世纪。她熟稔档案资料,具备广博的背景知识与深厚的理论素养,经常提出富有洞见且颇有争议的看法。而且,她关注史学的新转向,进入新领域,提出新问题,逐渐将关注城市宗教改革的经典社会史理路转变为探究仪式与情绪等内容的极具人类学色彩的文化史理路。可以说,卡兰特-纳恩的研究生涯及其贡献,是宗教改革史研究由社会史取径转向文化史进路以及何以有此转向的绝佳范例,值得中国探研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欧洲史与宗教史的学者们关注。

几年前,德国历史学家马蒂亚斯·珀利格努力说服卡兰特-纳恩在德国出版她的论文自选集,以展示这位美国学者的学术贡献。卡兰特-纳恩最后答应了这一邀请,并亲自挑选论文。2022年,《仪式、性别与情绪:苏珊·卡兰特-纳恩的宗教改革社会史与文化史自选集》在德国出版。^②实际上,德国较年轻的一代历史学家已经与师辈不同,愿意接受也懂得欣赏英语世界的学术成果。^③这也说明英语世界的学者不仅不让德国同仁专美于前,甚至在某些方面做出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他们。卡兰特-纳恩这位美国历史学家,在研究外国史的过程中,不仅做到兼收并蓄,而且能够别开新境,做出让德国学者认可与欣赏的研究成果。这同样可以给中国学界的外国史研究带来一定的启发与借鉴。

(作者付亮,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邮编:510632)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董欣洁)

^① Susan C. Karant-Nunn, *The Reformation of Feeling: Shaping the Religious Emotions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pp. 11, 159 - 188, 63 - 132.

^② Matthias Pohl, ed., *Susan C. Karant-Nunn: Ritual, Gender, Emotions (Essays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Mohr Siebeck, 2022.

^③ 譬如,卡兰特-纳恩这本学术论文自选集的邀约者和编者珀利格出生于1973年,现任教于德国洪堡大学。

From Social History to Cultural History: An Analysis of Reformation Studies by Susan C. Karant-Nunn // Fu Liang

As a renowned historian of German Reformation, Susan C. Karant-Nunn, who was influenced by sociology, Structuralism, Marxism, and social historians such as Bernd Moeller, Robert W. Scribner as well as Natalie Zemon Davis, embraced the social history approach to studying the Reformation in the 1970s – 80s. Her early works delved into the changes of society,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the rural and territorial cities of Saxony and Thuringia in the Reformation period. They exemplified the merits of a kind of historiography that combines a closing reading of the sources with innovative methodologies. Yet adopting social history has run the risk of being too reductionist in reading of religious belief as mere signifier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oncerns and of failing to understand past societies, especially religious societies, on their own terms. On this aspect, cultural history has restored the ideation, taking doctrines and beliefs not necessarily at face value, but more empathetically, with emphasis on the assertion that ideas shape reality, or at least shape people's perception of reality. The cultural turn in Reformation history took place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Karant-Nunn accepted anthropological theory, and tried, with "thick description", to analyze ritual and emotions in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Her innovative methodology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A Discussion of Studies on *Shiji* and *Hanshu* Tabl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able Writings // Zhuang Yaqiong

The Study on tables of *Shi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Hanshu* (*Book of Han*)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tud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an exemplar case through which domestic academic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distinguish and analyze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ross-cultural learn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Since the inception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of *Shiji* and *Hanshu* tables have continuously developed in depth and width, exhibiting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fully emphasiz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ual criticism,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scope of discussion, and references to some aspects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Some European and American scholars used *Shiji* and *Hanshu* tables to challenge the prejudices against non-narrative historical writing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which facilitated the in-depth cross-cultur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 However, European and American scholars have not provided a thorough analysis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writings of tables. By comparing the *Chronicle* by Eusebius of Caesarea with *Shiji* and *Hanshu* table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are both similarities of empirical knowledge and differences of historical concepts in general history writing in ancient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sisting on writing about divine views in Christian historiography, Western table writing in medieval times failed to diversify its genres to capture changes in history.

The Crisis in Modern Nigeri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1970s – 1980s and Its Response // Wang Yan

Nigeria occupies a vital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African historiography. This country is not only known as one of the earliest birthplaces for contemporary African history, the Ibadan History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modern African history are beyond doubt. Nevertheless, since the middle of 1970s, Nigerian historiography has undergone a grave crisis in the organizations of history, the enrollment of history majors, and the disbelief in the social value of history. In reflecting on history theory,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themes, Nigerian nationalist historians attempt to theorize this crisis. They argue that the crisis is a result of combined forces including defects of nationalism historiography in its themes and methodology, and government's policies that neglect the importanc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istorians respond to this crisis in a way to change the practice of empiricism in the past a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function of historiography. They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expand the themes of studying the history to ethnic relations, economic history,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other research topics closely related to contemporary African affairs, improve the research methods.

"Post-Post-Zionism" and the New Trend of Israel's Nation-State Narratives // Zhang Qianhong, Han Boya

A group of Israeli intellectuals have re-examine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raeli nation